

笔谈：九一八事变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2011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纪念日，为牢记历史、教育当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同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发言内容涉及九一八事变及抗日战争研究的诸多方面。兹将发言精要以笔谈方式刊出。（以发言先后为序）。

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武寅）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的今天，日本关东军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随即侵占中国东三省，走向了全面侵华的道路。可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日本侵华史，同时也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同的政治派别之间、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国内人民与海外华人之间，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联蒋抗日”，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坚贞不屈，英勇奋战，最终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联合宣言》、开罗会议、《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与宣言，都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所以，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今天，各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九一八事变，缅怀抗战先烈的丰功伟绩，探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精神动力和未来远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九一八事变，虽然日本右翼学者仍有种种否认侵略的歪理邪说，但总体上说，国内外学界还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根据检索，中国学者在最近的30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题，或将九一八事变置于标题之中的论文，有570多篇，大部头专著也不在少数。需要指出的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中，作为国内唯一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专门杂志——《抗日战争研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本身，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60周年，即1991年9月创刊的。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大都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其中不少文章也都与九一八事变研究相关。我相信，今天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将会进一步推动九一八事变以及抗日战争研究。

纪念并不仅仅是怀念过去，更重要的是着眼未来、着眼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稳定。我们要通过历史研究，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维护世界和平。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要与批驳日本国内的右翼言论结合起来，以正视听；要与弘扬抗战精神结合起来，以丰富民族精神食粮，涤荡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要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以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和人生观。2011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他强调：“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抗日战争史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辛勤耕耘、扎实创新，在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不断作出新的成绩。

关于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步平)

(一)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中的重要意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当时国民政府深知国联在制止日本侵略扩张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国联提出控诉,希望从孤立日本的角度争取到一些外交上的主动。蒋介石曾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然而,“九国公约”虽然反对任何列强对中国的独占,规定中国领土完整,但是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目的仍是调整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关系;“非战公约”规定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或纠纷的手段,但也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虽期待国际社会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但面对英、美、法的对日温和态度也无可奈何,在军事失利后“苦撑待变”。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外交上的窘困。但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英国与苏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但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在宣言中领衔。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而中国也确实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抗日如何牵制日军主力向东南亚的转移及与德国的配合;中国的持久抗战如何导致日本陆军主力改变实施进攻苏联的战略,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得以全力对德作战;中国如何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派出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在缅甸作战;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盟军如何在缅北最早发起反攻;中国战场如何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从而加快日本法西斯失败的步伐等问题,越来越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深化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重要地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从弱到强的转折点,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

(二)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对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作用

中国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的改变,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的结果。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过去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形成了谋求国家独立解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近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问题,表现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作用的充分评价,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各阶层在抗日战争中作用及矛盾的冷静分析等。

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研究与撰写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显著特色。学者们的研究力图全面反映共产党与国民党有联合同时也相对独立的抗战,全面反映全体中国人民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与日本军队的殊死搏斗,强调构成统一的中国战场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都是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威信的基本条件。在论述两个战场贡献的时候,近年来的研究并没有在两个战场的地位、主次那样的问题上进行过多讨论,摆脱了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突出国内矛盾与斗争的倾向,更多的是站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三)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展开共同研究

虽然中日两国学者间早就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领域开展了交流,但是由于中日历史问题在政

治领域、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层面均有反映,所以从2006年开始的由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实施框架而开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则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第一阶段研究报告在2010年公布后,关于历史认识是否需要跨越国境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就有争议的历史认识问题开展共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后自信和自尊的表现,是中国真正进入国际舞台中心的标志,它表明中国正日益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挑战,包括在学术研究方面。近代中国在抗击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悲情意识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动力,但也是导致“弱国心态”产生的原因。今天的中国则完全摆脱了近代历史上的被动局面,昔日的弱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正在形成。因此,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也应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历史悲情,扩展学术视野,开展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研究。

20世纪世界历史时代主题的变化与中日关系的走向(武汉大学 胡德坤)九一八事变过去已经80年了,但人们对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的中日关系的反思和认识仍一直在继续。本人试图从20世纪世界历史时代主题的变化角度,重新认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关系的演变原因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自古及今,世界历史是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以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了整体发展的时期。20世纪上半期是整体世界初期,世界各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成为战争与动荡时期。二次大战后,人类历史便进入了战后整体世界时期,即和平与发展时期。世界历史的这种整体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时代的主题,从总体上制约、甚至决定着中日关系的发展。

初期整体世界阶段是指20世纪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就时代而言,是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的时代主题决定了中日关系必定走向战争。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以军事手段,向中国、向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的空前规模的侵略战争,以抢占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1929年7月,日本法西斯军内理论家石原莞尔中佐在《战争史大观》中写道:“欧洲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的中心移到了美国,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是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争。”1931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中指出,日本若占领了“满蒙”,“就在对付从海陆两面而来的敌人美英俄,占据了有利地势。而且,实际拥有中国,国力将大增,就把握了东洋和平的关键,就能完成未来世界争霸战的准备”。石原和板垣都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他们的言论表达了这样一种侵略观点:日本要称霸东方,必然会同美国决战;要同美国决战,必然要先夺取中国,作为对美作战的基地;夺取中国,也必然要排除美国的干涉。这就表明,日美战争之前日本将先发动对华战争,要发动对华战争则先发动对“满蒙”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策划制造的。换言之,九一八事变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开端。

战后整体世界阶段是指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现在的世界史。就时代而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时代主题决定了中日关系必定走向和平友好。战后世界范围内冷战的展开,使国际关系长时间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状态,分属两大阵营的中日两国,也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已不单纯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它受着国际冷战形势的制约。处于西方包围中的新中国迫切希望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争取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国际形势。但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特别是自由民主党等保守党政府,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轴,唯美国马首是瞻,对新中国实施了亲美反华外交,参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使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希望寄托于日本民众,即通过民间友好交流的渐进式积累方式,以民促官,

达到恢复邦交的目标。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72年,中日两国排除了种种阻力,终于完成了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表明中日友好是历史的选择,是两国人民的选择,是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和平发展模式的需要。

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虽然还存在不少障碍,但从总体上看,友好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中日关系进入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有目共睹的。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争端,但两国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发展、合作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它规定了在新世纪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南京外交与九一八事变(台湾政治大学 唐启华)从国际关系史角度看九一八事变,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层次。中国史家称之为“九一八事变”,一般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到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议》签署为止,着重于探讨日本侵占满蒙,蒋介石不抵抗,国联不能主持正义制裁侵略。日本史家称之为“满洲事变”,从事变发生到1932年3月满洲国建立为止,着重于探讨关东军的独断独行,以及日本国内之军政宪政危机。英国史家则称之为“满洲危机”(Manchurian Crisis),从事变发生到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着重于探讨国联无法处理中日冲突危机,不久意大利、德国也随之退出,导致凡尔赛——华盛顿体制(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崩解,无法预防二战的爆发。

迄今,国内学者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在谴责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方面已有突破,但在外交上仍聚焦于日本侵略,较少检讨当时中国外交的问题。南京外交其实尚有许多有待研究的问题。诸如:南京外交的性质到底是革命外交还是修约?南京外交是否太过着重英美而忽视了日本?张学良在东北的排日政策是否太过粗糙,未注意处理满蒙悬案等,导致昧于知己。

其次,国内学者对于日本外交的研究明显不足,事变前后日本政军界历经重大变化,政党政治受到军方严重冲击,军界内的以下犯上及指挥系统紊乱,日本朝野对满蒙条约权利的重视等问题,仍缺少深入的研究与理解,不能知彼。近年来,中日历史共同课题的研究,已经增加了不少国内学界对日本观点的理解。中日韩三国合写历史教科书,也大幅度拓宽了国人的历史视野。但是,这些努力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长远的路要走。

再次,国内学界对于国际外交局势的研究甚少,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性质,中国与日本在此体制中的位置如何?1929年世界经济恐慌对此集体安全体制的冲击如何?国际联盟的结构与缺失如何……也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今日中国已然崛起,朝向大国地位迈进,然而世界大国不仅要有强大的硬实力,还需要有相应的软实力。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绝对是大国心理素质中重要的一环。毋庸讳言,今日历史学研究仍有许多可努力的地方,就九一八变变的学术研究而言,基本上还停留在弱国的悲情心态,以谴责日本侵略及国际不公为主要方向,宣扬毋忘国耻。这种方向在凝聚爱国主义抵御外侮的时代,是绝对必要的,但在和平崛起的今日,或许可以稍做调整,多点检讨中国外交自身的问题,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事变发生的原因,发挥历史的借镜作用。

如果要建构东亚未来长远的和平,学界或可考虑加强对日本的研究,进而探讨东亚文化传统及东亚国际秩序的问题,深层理解九一八变变的远因,以及日本当时的状况。相信如此将有助于国人以较高的层次观照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全局,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维护东亚和平。

若要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中国还必须具备能观照全球局势发展的软实力,从国际关系史的视野研究九一八事变,探索维护国际和平的基础因素,以及经济、外交、军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西方世界秩序间的对话与互动关系。具备这个层级的软实力,才能真正支撑一个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这个方向任重道远,近代史研究的同仁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请拿出事实来——向“十四年抗战”论者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振鹂)抗日战争研究中最大的歪曲是否认八年抗战,否定八年抗战,取消八年抗战,否定抗日战争开始于七七卢沟桥事变;宣扬“十四年抗战”,鼓吹“九一八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开端)”。我曾著文对一篇具有代表性文章的“论证”进行全面批驳。近几年,“十四年抗战”的宣传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意”,应再加辨析。

(一)那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修改本中加了一句重话:“现在国家已经明确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这就是说,“现在”“国家”已经确认“十四年抗战”,否定“八年抗战”。此话根据何在?该文没有注明。我判断此话是根据胡锦涛的一个报告,报告中明确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那句“国家已经明确”等等的话,很可能就是据此而说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把胡锦涛等同于国家了,这是不对的。胡锦涛说了不等于“国家”已经明确。也许不是根据胡的讲话,而是另有所据。那么,所据何在?应公开说明。我相信,“国家”没有“明确”过“十四年抗战”,否定过八年抗战;强拉“国家”为“十四年抗战”说撑腰,很不好。

(二)“十四年抗战”说的一个主要论据是从九一八事变起,“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中国的阶级动向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有人更说:“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举一事的对比来说明。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发出“宣言”,“宣言”宣布合作抗日的“四项保证”,其第三项是“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这个此时被取消的“苏维埃政府”,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是九一八之后成立的。这一个“成立”,一个“取消”,反映了中共政策的大调整,标志着中国内部阶级矛盾的大变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就是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中国内部形成了两个“国家”对立、对峙、对抗的局面。这个矛盾只居于次要地位吗?受中日民族矛盾“制约”吗?从一方“反蒋抗日”,另一方“安内攘外”来看,究竟中国国内矛盾与外部(中日)矛盾谁制约谁呢?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个矛盾形成于九一八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日,解决于七七之后“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之时,这是对“十四年抗战”说所依据的“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样”论的无情否定。

(三)多年来,许多“十四年抗战”论者都讲,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国有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抗战”。去年的《社会科学战线》刊登的一篇宣扬“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开端”的文章更进一步,提出“七次抗战”论:“‘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是中日战争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抗战有东北义勇军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达七次之多。”这里混淆了“抗日斗争”与“抗日战争”,把所有的抗日斗争都说成了抗日战争。这是不对的。抗日斗争未必尽属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就是中日战争,是中国、日本两国之间的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这个国家行为的具体化就是战争由唯一能代表国家的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主持领导,以国家的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这是一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是中日之间的战争的本质属性,中国抗日战争的本质属性。具备此属性的抗日斗争如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属抗日战争,不具备此属性的抗日斗争如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东北抗日联军、热河抗日救国军等民众抗日斗争不属抗日战争。习惯上所说的绥远抗战也不属抗日战争,因为尽管傅作义的军队是中国国家的武装力量,但它抗击的是匪伪军,不是日本国家的武装力量。所谓国家武装力量,就是国家正规军、政府军。

“十四年抗战”论者批评“以所谓‘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是否参加抗战为‘标准’来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批得没有道理。实际上，作为当时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国民政府不只是“参加”抗战，它一开始就主持领导了抗日战争。说它“参加”，是有意无意贬损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从九一八到七七的六年间，前一半有抗日战争，主要是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后一半有抗日斗争，没有抗日战争。因此历史上并没有连贯的“六年抗战”，也没有所谓“六年局部抗战”加“八年全面抗战”的“十四年抗战”。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军事侵略，中国南京中央政府不抵抗，东北地方政府不抵抗，国家没有抗战，因此就谈不上“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开端）。”日军打到黑龙江省，有了抵抗，即江桥抗战。这可以说是抗战，是当时中国第三层次政权的抗战，非完全意义上的抗战。如果以此为中国的抗战的起点（开端），那只是“三年（1931—1933）抗战”的起点，不是所谓“六年局部抗战”或“十四年抗战”的起点。

“十四年抗战”论者宣扬他们的主张、为他们的主张辩护，主要靠讲“道理”（大多是空泛不切题的“大道理”）和摘引一些中外人物（政治上的大人物、日本“十四年战争”论的学者等）的片言只语，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抗日战争多少年，要看事实，“十四年抗战”之说不能成立，是因为没有连续14年抗战的事实（主要是1934、1935、1936这三年没有抗日战争）。如果有人还坚持“十四年抗战”，请拿出事实来吧，主要是请拿出1934—1936年真正抗战的事实。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臧运祜）在2006—2009年的第一阶段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期间，我们曾经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方称“满洲事变”）进行过多次的交流和讨论。2010年1月的报告书发表之后，我们又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兹将有关情况和相关问题进行简单的报告和小结。

（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共识

关于“九一八事变”，中日两国史学界已经取得丰硕而深入的研究成果，相关资料亦可谓汗牛充栋。这为我们的共同历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学术基础。我们将双方学界的主要成果和主流见解，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论述，并取得了以下共识：1.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双方都论证了该事变发生的“近因”，并论述了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挑起事变、进而扩大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事实。2. 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断被扩大的原因：双方都指出了日本军部中央对于关东军行动的默认和政府的追认，以及中国政府的“安内”方针和东北当局的不抵抗主义。3. 关于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双方都指出了它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的关系。4.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双方都指出了日本扶植、承认伪满傀儡政权并为此退出国际联盟的历史结局。

（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分歧

在目前的报告书中，双方还存在以下分歧：

1.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下限：中方以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为基本标志；日方则以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为标志。2.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和背景，中方指出了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的“远因”和日军发动该事变的计划性；日方主要强调的是关东军的谋略和国内政治与国际因素。3.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反应，中方论述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日方论述了日本政府解决事变的努力和军部中央的指导。4. 关于伪满洲国，中方指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战争罪行；日方虽然不否认满洲国“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的虚妄性，但主要论述了日本在满洲国的统治实绩（例如币制改革、工业发展）以及在铁道建设、产业开发等方面的近代化成就。

（三）小结

九一八事变承先启后，不仅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重要

开端。因此,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共同研究,除了对于该事变本身的研究之外,还涉及到对于此前近代中日关系的看法,也涉及到对于此后中日战争史的论述。经过此次共同研究,双方在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

在九一八事变的共同研究中,中日双方委员都曾明确指出,双方在历史认识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认为:对于九一八事变,既要关注其“远因”——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不平等发展与日本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近因”——1930年代初期的中日关系与东北情势;又要重点研究当时当地中日双方(中日两国当局、东北当局与日本关东军)的状况。从而得出日军发动、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必然性与计划性的结论。当然也应看到主要出自关东军谋略而于1931年9月18日在柳条湖发生的偶然性。其实,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如果片面强调、关注一面而排斥、忽略另外一面,都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九一八事变80年来,尽管某些日方资料仍然存在较大的严重缺陷(例如关东军的档案文书),但基本史实是清楚的。本着求同而存异的原则,我们的共同研究就是要准确地论述这些事实,尽管在具体论述上会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述方法。

2. 关于九一八事变与十五年战争的连续性、断裂性问题

日本的“十五年战争史观”,自1956年鹤见俊辅提出、1986年江口圭一相关专著出版以来,已经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见解。中国学界自1980年代提出中日十五年战争史、2005年明确提出十四年抗战史观,目前也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有鉴于此,此次共同研究开始之初,双方学者对于近代(战前)中日关系的历史分期,一致同意将1931—1945年的中日关系,作为第二部“战争的时代”。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这种重要共识的达成,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为共同历史研究的迅速展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状况的认识。日方委员波多野澄雄指出:“对于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这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应该看作是连续性的还是阶段性的这一点上,依然备受争议。”日方的户部良一教授、安井三吉教授,均表达了他们对于“安定化”或“小康状态”的看法。笔者认为,以上看法实际上关系到十五年战争史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的问题。总体而言,从“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虽然呈现过各种可能状况和选择(断裂性),但并没有改变日本十五年战争的连续性。具体而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尽管在1933年5月以后出现过“稳定化”与“小康状态”,但并没有改变卢沟桥事变以后走向中日战争的必然性,中日战争仍然不可避免。

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希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从历史的实证研究或微观考察,事变的确出于关东军部分将校的“谋略”,日本政府也的确出台了“不扩大方针”。问题在于: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制止住驻外军队的“擅自军事行动”?为什么事后竟然追认“冒犯统帅权”的朝鲜越界军为“合法”?又为什么最后出台外交“焦土政策”?承认日本军队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满蒙因素决定论”,即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不仅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抉择。九一八事变当时,若槻礼次郎内阁表面上提出“不扩大方针”,但在国际舞台上却一直为关东军的行径张目。接替若槻的犬养毅内阁走得更远,从内阁的构成看,“比前内阁更接近军部,以积极态度应对满洲事变,与军部和关东军更是同调”。犬养本人也多次在国会讲演中强调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并通过贵族院发表《感谢陆海军将士决议》,内中对关东军“表示深厚的敬意”。斋藤实内阁时期断然宣布退出国联,推行“焦土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三任内阁之所以追随军部和关东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追逐“满蒙权益”的同一性。尤其是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动轻易攫取“满蒙”之地,更使日本政府很快与军部站在一起,在维护

“国家利益”的招牌下，推进侵略战争的扩大化。

第二，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乃至军权超越政权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日本军权膨胀的实战大演习。众所周知，关东军策划柳条湖事件，朝鲜军擅自越界，以及轰炸锦州、进犯热河等一连串“擅自军事行动”，事后均得到军部、政府以及昭和天皇的“追认”，其结果推动了日本军权不断膨胀，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政体的完备。

第三，自下而上的日本“国家改造”运动，推动了“军国热”狂潮。从1930年右翼刺杀滨口首相为开端，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爆发，日本社会右翼及少壮派陆海军下级军官连续策划及发动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队事件、血盟团事件、相泽事件，以及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等。这些法西斯暴力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排除日本的政党政治，铲除财阀，实行国家垄断经济体制，树立军人当政的法西斯政权。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成为推进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主动力量，也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军国热”狂潮，日本社会包括民众阶层掀起远比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要狂热的参军热、捐款捐物热，以及游行示威支持关东军等狂热举动，为构筑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四，“财阀转向”，“军财一体”体制的确立。九一八事变后，在“军国热”的狂潮下，日本财阀不断遭受社会右翼及军人法西斯势力的冲击，甚至是生命威胁，各财阀一反以往与政界打得火热的立场，转而以“机密费”、“军事献金”等形式去迎合军部，并乘机向东北新殖民地伸出触角，以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沉重打击，同时相机将财阀人物塞进军事独裁政府，多充当大藏大臣，形成武力与资本的结合。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对外扩张的欲望和本性，也是促使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裕仁天皇和九一八事变(中共中央党校 李东朗)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的、旨在侵占整个东北的恶性事件，是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它的发生和恶性演变，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巨大灾难，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政治走向，并最终将日本引向法西斯战争的深渊。而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裕仁天皇，在九一八事变的演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变的恶性发展和他的态度、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一，纵容关东军的非法行动。九一八事变之前，裕仁天皇就知道关东军蓄谋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事变后，他迅速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内阁首相若槻的报告中了解了九一八事变真相。但是，裕仁天皇对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没有谴责，对其持续的侵略行动没有阻止；对内阁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完全认可；尤其是对高级军官的擅权妄为、违宪违法的行为，没有批评，更无追究和处罚。裕仁天皇的默认和放纵，鼓舞了关东军的侵略野心，助长了他们的侵略气焰，从而使事变延续、扩大。

第二，批准和支持日军对中国的扩大侵略。1931年11月，裕仁天皇批准日军对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驻地锦州发动进攻：“如果张学良在锦州附近重新集结部队，事件扩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话，余可同意事件扩大。”在他的支持下，日军兵分两路向东北纵深地区进攻，于1932年初先后侵占锦州和黑龙江省。裕仁天皇以最高统帅的身份，确认和表彰了日军侵占东北的“功绩”。他在向关东军发出嘉奖其“忠烈”的敕语中，把关东军的侵略行动美化为出于“自卫的必要”，称赞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果断神速”。对关东军的暴虐行动他表示：“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1932年1月，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裕仁天皇支持日军的这次侵略行动。他批准日本海军向上海增兵，直接操控上海战事；他撤免指挥进攻失败的日军将领，下令日本陆军多次派兵，增援其在上海的海军；批准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原田中内阁陆相、军事参议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日军对中国上海的进犯，一直操控在裕仁天皇手中。

第三,支持炮制“满洲国”和侵略华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关东军和日本政府决定把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对此,裕仁天皇完全赞同。1932年3月9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成立。6月16日,裕仁天皇下达敕令,明令关东军保护“满洲国”。1933年初,当国际联盟否认“满洲国”后,天皇裕仁批准内阁提议,决定日本退出国际联盟。1933年初,日军侵占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山海关,继而进攻并占领热河。5月,入侵冀东的唐山、密云、三河、遵化、蓟县等地。日军的这些行动,都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批准。

实际上,在侵略中国问题上,裕仁天皇和日本军政要员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虽然他曾有约束和克制日军行动的言论,但在日军侵略阴谋得逞和侵略得利的诱惑下很快就放弃了。而他的默许、支持、批准和鼓励,是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发动一系列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使之连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迷恋侵略、唯侵略是图的思想指导下,他把日本引入了疯狂的侵华战争之中,把日本引上和人类文明与正义为敌的法西斯道路,最终走向了可耻的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其历史认知(安徽大学历史系 陆发春)中国知识界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认知,就时间性来说是自事变发生,历经一二八沪松抗战、伪满洲国成立、国联调查团等重大事件,止于七七事变后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笔者欲从以下几个关键词,探讨中国知识界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认知。

(一)悲愤。中国知识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反应是“震惊”。震惊之余的知识分子与国人一样,走上市镇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行动;或利用手中的“笔”,开展抗日宣传。1931年9月19日,胡适写下一首诗:“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悲愤甲午战争之后的40年,中国“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陈寅恪在9月23日致信胡适,说读了胡适的诗后,感同身受,“以四十春悠悠之岁月,只今仅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胡适、陈寅恪等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二八事变后,致电蒋介石,要求守土有责的当权者切勿“阳战”而“阴和”。东北是中国的国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知识界对九一八事变的性质非常清楚。例如,胡适与陶孟和在9月23日找到颜惠庆,要求推迟即将在中国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他们在给该学会组委会的电文中,明确指出:“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会议延期。”是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上海召开,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国际联盟等170多人与会。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国内召开的一次大规模国际会议,中国知识界胡适、丁文江、马寅初、陶孟和、陈衡哲、蒋梦麟、吴贻芳、周寄梅、杨杏佛等大批人士出席,并利用太平洋国际学会,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占东北领土的愤怒心理,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人对东北问题的原则立场。

(二)理性。梅贻琦在清华大学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提醒各位师生:“是以沈阳既去,吉林、黑龙江、锦州随之而陷。大家不要以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时敌方时时可以再有动作。或另有阴险图谋。实则形势非常可危,吾们应当深刻纪念,时时注意准备才是。”(《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434号)如何才能阻止日本的军事侵略呢?蒋廷黻认为“最低限度,民众团体、舆论机关及国会代表要群体追究这事件的责任和经过。政府呢,将不待国民的催迫,就会在国会里发表负责的、附有证据的说明。同时又将不待国联的调查,就会发表白皮书或红皮书或蓝皮书使全世界都能明了该事件的真相”。但这在中国一样都没有。他提出国人应该反思:“这是个甚么样的政府?甚么样的国家?”“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还要发生。”(《九一八的责任问题》)强调国人不应对九一八事变后外交界提出的在东北南部锦州地区划为中立区拟议,采取冷漠和坚决反对态度;虽说上街游行的学生和老百姓

大部分是爱国的，但中日问题也不仅是口号、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等能解决的，那些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的，往往是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和军人；显而易见，要注意到爱国口号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情况，“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当时，中国知识界以《独立评论》、《大公报》等媒体为舆论阵地，坦陈对时局的认识。

（三）失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的应对举措，令国人痛心和失望。梅贻琦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过了两天，国内毫无动静，或疑为一时之策略，不意始终未予抵抗，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当时知识界虽对政府失望，但表示对中国的前途不绝望，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不绝望。蒋廷黻指出中日之间，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相信中日力量对比在时间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一文中，指出：“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彻底的缔造，是没有办法的。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逃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实告我们，倭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的时候，他又从浅看中的失望、深看中有希望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入阐释，指出东北是亡不了的，国际形势是有机遇的，而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并以一二八上海抗战，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事实为例，为国人指陈国势：“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我们若以民族的希望为宗教的信仰，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尽其职为这信仰之行事，则大难当前，尽可处之泰然，民族再造，将贡一份助力。宋明的道学先生尚能以四书五经养其浩然之气，我们不能以近代知识养我们的浩然之气吗？”

国难之际，中国知识界以近代知识和独立思考为国家纾祸，为大众解困，表现了高度的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

九一八事变与华盛顿体系（首都师范大学 史桂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认为欧洲大战“对于日本的国运发展来说，是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应举国团结一致，享受这个难得的天佑”。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后，立即出兵山东。日本还乘欧战之际，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在华投资急剧增长，据统计，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为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达11.424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6倍。

巴黎和会上，由于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没有取得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法理”依据，1921年11月，美、英、法、意、日、中、荷、比、葡等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明确规定了美、英、日、法、意五国主力舰数量和吨位，日本主力舰吨位是英美的60%。日本没有实现达到英美主力舰吨位70%的愿望。但是，正如日本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所言：“日本实行八八舰队计划确实有财政上的困难”，这个比例与日本财政状况相适应的。由于《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只限制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争夺。华盛顿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列强取得在中国相对“平等”的机会。

华盛顿会议确立了东亚新的国际秩序，“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远东外交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努力重新定义相互关系。在美国的主导下，旧秩序崩溃，以‘经济外交’为基础的促进调整诸权益的新时代到来”。华盛顿会议规定了远东新的国际秩序，日本在自身国力不足与列强抗衡的条件下，继续采取“协调”外交路线，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推进大陆政策。1924年6月，币原喜重郎任外相，开始了著名的“币原外交”时代，币原是“协调外交”的典型代表人物。币原喜重郎认为“协调”并不是软弱，而是在“协调”中，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满蒙”的特殊利

益。其实,币原喜重郎一方面标榜“协调”外交,一方面对内积极“协调”军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军事为后盾实现外交上的“协调”。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币原“很好地利用了军方的活动,在‘不干涉’的名义下达到了干涉中国内政,维护其‘满蒙权益’的目标”,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不过,日本仍一直在寻求突破华盛顿体系制约的机会。1931年1月,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蒙政策的危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同年5月,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私见》中,提出“按照日韩合并的要领,对外宣布满蒙合并”。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表明,它已经彻底撕下了“协调外交”的面具,告别欧美列强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要在远东建立日本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日本的侵略行为后,1932年4月,李顿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李顿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表决《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报告书以42票赞成、1票弃权(泰国)、1票反对的结果宣告通过。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奉劝日本从中国撤兵。日本在国联上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称:“帝国政府认为已经没有与国联合作之余地,根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彻底告别华盛顿体系,与既有的国际秩序决裂,并逐渐走向了全面侵华战争之路。

九一八事变与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共中央党校 张卫波)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民族复兴意识日益增强。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国人的民族复兴意识与日俱增。他们迫切希望有朝一日能洗雪国耻,复兴民族。如,蒋介石在日记中誓言:“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中国共产党认为,日军的暴行将会激起中国人的觉醒和反抗,指出“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的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在愤怒之余,“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参加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甚至在向全国的通电中喊出了“中华民族复兴万岁!”的口号。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不沦亡,即复兴耳”。抗战以复兴民族,是当时的时代强音。

其次,要求改良政治的呼声高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省相继沦陷。在惨痛的国难面前,人们已经无法置国事于度外。为了救亡,他们奔走呼号,要求改良政治,废除一党专政,指出:“明知一党之力不能打破难局,则亟应取消一党之‘狄克维多’,公开政治,予全国人民以充分自由共赴国难,政治才有新生气象。”除此之外,广大民主人士还呼吁保障民权,指出:“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这都有力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步伐。

第三,重视国民外交,积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九一八事变后,外交事务受到高度关注。如蒋介石反思之后,认为事变发生是由于“内乱评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故而,痛定思痛,他决定以此为契机“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将东北问题提交到了国联,可谓是蒋介石注重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实,就在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调整内政外交政策的同时,当时的舆论也对国际干预抱有很高期望,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如当时影响较大的《申报》不仅呼吁国际联盟制止日本侵略,而且还希望非战公约组织和华盛顿九国公约组织来主持公道;《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也刊载胡适等人的文章,呼吁寻求英美等国及国联等国际组织的帮助。尽管事后证明,国联的威望和力量并不能迫使日本退兵东北,完全依靠国联只是一种幻想。但是,应该看到这在博得国际舆论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国民外交的一种积极尝试。

第四，内战思维逐渐为全民抗战思维所代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的内战正酣。不仅有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重兵“围剿”，而且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南京、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峙。而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之后，面对急迫的民族危机，交战各方都对各自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全国上下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呼声中，首先是宁、粤实现了和解。接着是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政策方针上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尽管内战向抗战转变的过程艰难曲折，歧路重重，但广大国民对“抗战”还是表现出了高度认同。特别是国共两党最终实现第二次合作，进一步表明了内战思维向抗战思维转变的不可逆转。

总之，这些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化，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说能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曾景忠）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东北军）对日不抵抗问题，大陆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近20年中，虽有些学者已对这一说法批驳，张学良晚年对此也作过澄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的，不能诿过于中央。但至今无论是学术著作、教科书，还是普及读物、媒体和影视作品，依然充斥上述观点。对此甚有澄清的必要。

1.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观点，依据一些回忆录的说法，不足为凭。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蒋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实际上，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根本不在南京。蒋氏当天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19日他才得知日军进攻沈阳的信息。

2. 事变前“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不予抵抗”方针不同。事变前，日方在东北屡挑衅端，如万宝山事件、朝鲜迫害华侨活动、中村大尉事件等，中日关系紧张。蒋介石因剿共和宁粤对立，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方针，主张对日方挑衅力避冲突。张学良也表示赞同，并指示东北军实施这一方针。事变前对日方挑衅“力避冲突”，与对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不予抵抗，不能混为一谈。

3. 事变发生（日军进攻北大营）后，张学良自主地下达不抵抗命令。大量电文表明：9月18日晚，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第七旅王以哲旅长，多次请示张学良，张都下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4. 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政府、蒋介石采取的是“诉诸国联”和准备自卫的方针，与张学良纯然“不抵抗”方针不同。蒋介石谋求国内统一，准备抵抗，决定在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掌控东北、华北大权的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不抵抗，蒋介石默认，但对日军可能在中央政府直辖地区发动武装进攻，蒋介石明确实施自卫抵抗的方针。他对烟台驻军师长刘珍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参谋长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官员指示：不管日本的陆军还是海军，如有越轨行动，“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1月中旬，国民党“四大”作出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国民政府并酝酿，一旦与日本交战，准备迁都、发表对外宣言。4个月后又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调集第五军支援第十九路军作战。这与张学良在东北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成鲜明对比。

5. 九一八事变后，不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是张学良不执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抵抗命令。事变发生，日军轻易侵占辽、吉二省，11月又攻占黑龙江省城。黑龙江失陷后，辽西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全国寄望张学良能守卫东北仅剩的一块战略要地锦州。蒋介石、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多次提醒张学良，必须守卫锦州，不能向关内撤兵。为守卫锦州，中央可调部队北援。蒋

介石抽调航空第一队到北平,归张学良指挥。但张学良执意违抗命令,擅从锦州撤兵。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尽力抵抗。由于张学良的主力部队早已撤入关内,日军没有费力,于1932年初轻易占领了锦州。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从未对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只是事变发生之初没有命令张学良实施抵抗。但至事变后期,即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抵抗时,张学良却拒绝执行对日抵抗的命令。所以,应该把“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这句话中的“不”字,从后面移到前面:“张学良不执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抵抗命令”。

6. 张学良自主不抵抗,基于保存实力的动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军队和国力难以抵抗强敌,同时国内未完全统一,不具备发起一场大规模抵御日本进攻战争的能力,但是,并非不能进行局部抵抗,如各地义勇军抗日和马占山江桥抗日,表明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意志。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曾建议:应集中几个旅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得于国人。但张学良没有听从于学忠的建议。这也证明,张学良不是因执行中央政府命令而不抵抗的。张学良对日怀有国仇家恨,应具爱国思想,但舍不得消耗他的军事实力用于抗日。他明知放弃辽西,日本取得整个东北三省,即可成立伪国,却不肯在锦州与日军一拼。因此,他的“不抵抗将军”之名其来有自。

从《申报》看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成立伪满洲国的抵制(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李淑娟)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有政治侵略、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几种方式。随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其中文化抗战是反侵略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化抗战中,报纸成为反侵略斗争的喉舌和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的唯一办法是不抵抗和依赖国联。不抵抗即军事上不抵抗,依赖国联即外交上希望国联成员国的大国,制止日本的军事进攻。为此,中日两国在国联展开了长达17个月的外交战争。日本为了欺骗国联和中国人民,掩盖事实真相,一方面,在世界上展开了外交游说,以竭力使西方大国相信是中国人民挑起的争端;另一方面,利用日本控制的新闻报刊,在东北境内进行谣言惑众的侵略性宣传,千方百计地制造声势,企图为其军事进攻扫除一切障碍。面对日本强大的外交和舆论攻势,国人能否认清日本的侵略本质和伪满洲国的真相,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国人反响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旧中国历史上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申报》。《申报》对此多有记载,并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它的成立遭到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和抵制。无论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外交部、驻外使节,还是社会贤达、名流人士、海外侨胞、社会民众团体、报馆,均口诛笔伐,愤怒声讨和揭露日本对满阴谋,公开谴责其侵略行径,拒绝承认伪满政权,否认伪满洲国,主张武力讨伐剿灭伪满洲国,另希冀国际社会公平裁决,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侵华问题。随着日军侵华的步步深入,其抵制的态度也愈为激烈。其中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的有:汪兆铭、罗文干、郭泰祺,胡适、颜惠庆、程潜、马俊超、孙科、孙镜亚、张知本、熊克武、何世桢、柏文蔚、张发奎等人。从电文内容看,地方政府的态度强硬于国民政府,民间社会各团体的讨伐激烈于政府的呼声,并有具体的讨伐措施。如,调集兵力讨伐伪国,召回驻日公使,厉行经济绝交,且批评政府“始误于不抵抗主义,继误于依赖国联”。

透视这些即时报道,反映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申报》的爱国立场成为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抵抗阵地。媒体作为时代的呼声,与国家命运是遥相呼应的。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申报》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敢于直言,痛骂日本侵略者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与厚颜无耻的侵略行径,一些时评击中了日本侵略者的要害,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气节和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申报》的如实报道,向国人和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真实面目,戳穿了日本制造的欺骗谎言,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有力地呼应和支持了中国代表在国联的外交斗争,使日本的国际信誉大大降低。1933年2月24日,在国联大会通过的报告书中,否定了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和建立伪满洲国的侵略活动,使日本外交以失败而告终,乃至最终宣告退出国联。

(三)社会各阶层的反侵略呼声,反映了在大敌入侵的危机关头,国人并没有被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势所吓倒,反而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申报》的报道,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粉碎了日本媒体混淆视听的阴谋;同时也说明,日本的侵略是不得人心的,其欺骗伎俩和侵略行径只能激起中华民族各个阶层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另外,这些报道还反映了《申报》及全国人民对东北沦陷区同胞的深切同情和关注。

文化抗战和军事抵抗一样,同样需要视死如归,同样需要大义凛然。这种不屈不挠的唇舌之战,尽管不能驱逐日本侵略势力,但在舆论上将使日本陷于越来越孤立的境地,加速了其侵略战争的失败。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口过剩”论的虚妄(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夏卫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早在事变爆发前,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已把中国东三省定位为日本“对俄作战的主要战场,对美作战的补给源泉”;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更是声称“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道路”。除了日本军人对中国东三省有覬覦之心外,日本许多政治家,甚至普通民众也都对中国东三省抱有“特殊感情”,认为东三省是日本在进行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以“牺牲十万生灵和二十亿国帑”为代价得到的战利品。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在为武装侵略中国制造社会舆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人口过剩”论。日本在1913年至1926年间,每年增加的人口约为64万,1926年日本总人口达到6300余万。这与正处于出生率不断下降的欧洲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国内的“人口过剩”论便开始尘嚣甚上,宣称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向中国殖民。当时,美国为抵制外来低价移民劳工,于1924年通过“移民法”排斥外来移民;澳洲为维持“白种人的澳洲”,更是拒绝有色人种迁入;南洋群岛则为英国殖民地。在此逻辑之下,既然日本人口迁移东进或南下受阻,就剩下西进一条路了。日本学者山田武吉在其《日本新满蒙政策》一书中,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依据,公开叫嚷日本“奖励海外移民,乃今日当务之急”,而“满蒙因地理接壤之关系,为日本唯一优美之海外发展地域”。他还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我国之殖民政策,在提高亚细亚有色人种之文化与实力……其宗旨在共存共荣,并非侵略的、征服的、高压的行为。”据当时资料分析,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为156人,不及比利时(250人)、荷兰(200人)等国,就是中国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人口密度也远远超过日本。而且,人口的多寡情况,绝非是一国可以侵略他国的理由。

当然,日本炮制“人口过剩”论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内因素。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工业、农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财富却落入日本财阀手中。当时日本农民上交的地租占其收入的50%至58%;日本工厂中纺织工人,其工资水平还不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工人高。因此,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工农业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善。一般来说,人口的出生率与生活水平成反比。生活贫困容易导致新生儿的高死亡率,为了增加家庭成员,只有通过高出生率的办法来对付高死亡率。“人口过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困而产生的,日本政府将两者的因果关系加以颠倒,以“人口过剩”来掩盖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病,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并为其对外侵略作铺垫。日本这一策略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可以说,它取得了日本军国主义所希望的效果。在“人口过剩”的幌子之下,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迅速得到其国内的广泛支持,甚至在国际上也博取了个别欧美学者的同情,认为“日本殖民中国,是迫不得已的;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势所必然的”。

1931年夏,中国长江流域处于空前的水患之中,而国民政府却全力“围剿”中共苏区。欧美列强身处世界经济危机之中,无暇顾及远东地区;苏联当时正在努力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这一切都为日本打破列强在远东的利益格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日本侵略者毫不迟疑地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关内移民(1931—1937)(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孙瑜)1931年在东北大地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它不仅使中国的政局发生改变,也使2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东北关内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北和河南)热潮被迫中止。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些移民的原因、特点、概况和性质,而对关内移民中止的后果则鲜有论述。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阻挠中国关内移民进入东北所造成的“恶果”,作一简单介绍。

(一)导致了中国关内民众的生活愈加困苦。民国以来,关内人民由于天灾人祸、人多地少等原因在原居住地难以生活,而土地丰饶的东北吸引了大批关内移民。这种移民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属于中国人口自发的国内转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的原因,关内人民赴东北之路受阻,其中很多人不得不奔赴他方。如,当时不少人被迫转而选择“走西口”,即前往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走西口”移民主要来自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安徽等地。但是,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故而,这些移民在西北生活的也很艰难。当时流行的“山曲”,即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东三天西三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扔妻子别父母实在冤心。

(二)阻碍了东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东北关内移民中务农者占大多数,但仍有一部分人从事工商业。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关内的资本。当时很多移民开办杂货店,经营布帛、烧酒、木棉、鞋帽、药品等,同时收购东北地区多余的粮食,运往关内贩卖。因此,不少移民积累了资本,扩大了生意网,推动了东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另外,资本积累到一定数量的富商大贾们,还在东北创立近代工业,从事榨油、烧酒、缫丝等行业。可见,东北的工商业受惠于移民者颇多。九一八事变后,关内移民的减少,使流入东北的资本大幅下降,且不少移民工商业者无法忍受日伪的肆意盘剥和无耻掠夺,不得不逃回关内,从而使东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遭受重创。

(三)日本移民开始“盘踞”东北各地。随着中国关内移民人数的急剧减少,日本移民明显增多。日本政府从1932年开始,先后向中国东北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农业移民活动。其中,第一次移民492人,第三、第四、第五次移民共1800户。但是,日本殖民者对此并不满足,遂于1936年5月又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提出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如果该计划得逞,届时日本人将占中国东北总人口的1/10,成为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主要民族之一。除农业移民之外,日本政府还大量向东北增加驻伪满的日军、伪政府中的日本官员、工商业者及自由职业的日本人。结果是在东北的日本人从1930年的233749人,到1936年增至727614人,短短6年,增长了2.1倍。日本殖民者为改变东北的人口结构,还在这一时期向中国东北迁入约25万朝鲜移民。然而,多行不义的日本殖民者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走向彻底失败。“盘踞”中国东北数十年的日本关东军和“开拓团”民,或仓惶逃回日本,或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国,结束了“寄生”东北的殖民生活。

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任期内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综合考量(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段永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远东战略主要包含对日、对华、对苏三个方面,其中,对日政策是美国远东战略的核心部分。由于伪满洲国的特殊性,美国在制定对其政策时必须全盘考虑,一方面避免因态度过于强硬影响美日关系,另一方面又担心“绥靖”日本侵略而影响中美关系。因此,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后,通过远东司副司长汉密尔顿的1933至

1934年远东之行所提交的报告,重估了胡佛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决定继续实行“不承认主义”,从中可见美国政府在制定对伪满洲国政策时的多重考量。

(一)现实主义压倒道义原则。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种传统理论。“理想主义”源于美国文化中的“使命观”,认为美国受上帝的委托对人类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责任,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球。它的逻辑延伸必然是美国优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必将领导世界;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角色,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国际关系的本质而不是内政的临时需要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当日本直接侵略中国东北时,胡佛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来说并非命运攸关的地区,因此无意承担对日战争的风险来援助中国,现实利益压倒道义原则。然而,对于九一八事变,美国又不可能置之不理。在胡佛的同意下,史汀生发表了“不承认主义”照会,声称不认可日本在中国东北造成的局势。“不承认主义”虽然在日本武力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毕竟体现了声援弱者反抗侵略的“理想”。罗斯福当政后,继续采用“不承认主义”作为对伪满洲国政策,同时,又时刻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利益。1934—1935年伪满洲国《石油专卖法》出台前后,国务院与美孚石油公司合作,以共同对抗伪满洲国的石油垄断。双方的合作最终无法阻止事态发展的进程,美国于是决定放弃在伪满洲国的石油利益,而保全在日本的石油业务。这一事件表明,在现实利益面前,美国的“理想主义”又会有所让步。

(二)远东司在制定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考察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过程中,远东司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作用在很多时候甚至要超过国务卿。美国远东司始建于1908年,但在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最大的时期当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此时的两任司长霍恩贝克与汉密尔顿通过驻远东各地的使领人员获取信息,做出判断,并以此影响国务卿甚至总统的外交决策。由于这一时期的美国远东司权限极大,迪恩·艾奇逊说他们“好像是封建的诸侯”。罗斯福主政后,赫尔对远东司的意见极为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就是远东司,或者说就是霍恩贝克本人。从1933年派出副司长汉密尔顿出使远东,到1934年美国再次确定将“不承认主义”作为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基础,霍恩贝克一直为此积极奔走。及至日本全面侵华后,虽然霍恩贝克改任国务卿赫尔的高级政治顾问,副司长汉密尔顿升任司长,但他仍然操纵着美国的远东政策制定。由于霍恩贝克对日态度强硬,在国务院内被视为“鹰派”人物的代表。当然,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绝非一人一力而为之,但至少说明,远东司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作用还体现在1941年的美日会谈过程中。当时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除了国务卿赫尔之外,还有三位远东司要人,即霍恩贝克、汉密尔顿与包兰亭,赫尔亲切地称他们为“我的三位首席远东问题专家”。正是借助于远东司专家的帮助,赫尔在美日会谈中针对伪满洲国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并认识到围绕太平洋霸权的美日争夺,不是通过对伪满洲国等问题的妥协所能解决的。

(三)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制定深受利益集团及大企业的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绝不能小觑。例如,在伪满洲国《石油专卖法》出台后,纽约美孚公司的亚瑟·梅(Arthur G. May)通过与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会谈,希望国务院出面向日本发出抗议。而美国政府已经先美孚一步,通过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日本外务省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专卖将损害美孚石油公司利益,并且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及《九国公约》。日本政府应该运用其影响,阻止‘满洲国’政府采取那些将会违反‘门户开放’原则以及‘满洲国’当局所同意予以尊重的许多条约规定的措施”。此事表明,关于美国在伪满洲国的商业利益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做法是一致的。美国政府此举虽未能阻止《石油专卖法》的颁布,以及美孚石油公司从伪满洲国撤出的厄运,但还是最大限度维护了美孚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同时也表明,一些对外交事务并不正式负有责任的团

体和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外交关系的进展。

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期内的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虽较胡佛总统时期未在实质上有所更易,这不得不说是基于远东大战略的综合考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远东战略发生了巨大变化,“援华制日”逐渐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方面,并最终演变为与日本(包括伪满洲国)之间的战争,持续了10年的美“满”关系遂告终结。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一点新材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张量)九一八事变80周年前夕,沈阳一位专门收藏有关东北抗战文物资料的詹洪阁先生专程来到北京,向我出示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占元主动抵抗日军的新资料,材料虽不多,但极为珍贵。

张占元是沈阳城北人,东北讲武堂第9期毕业生。1930年出版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通讯录》中,这样记载:“张占元。23岁,中尉,家住沈阳城北二乡六王屯”,同时附有其一张戎装像。据詹洪阁采访张占元的后人得悉,张占元曾任东北军机枪连连长和张学良卫队五连连长。

九一八事变时张占元抗击日军的情况,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第31辑《九一八纪实》中,曾有张占元属下排长赵明义的回忆文章。他回忆说:“张占元带头率部向敌人猛冲,距敌百米时,日军发现铁路西侧有我军攻击其背后,遂发出惊呼并开始射击,激战中,我们几次进攻均未得手,我们连排长同时负伤,只得放弃,撤出战斗。当退到20里外的阿吉堡子时,张占元因伤势严重来不及抢救死去,大家沉痛地将他换便服入殓……”张占元在九一八事变当夜撤退途中,遇到日军后主动提出进攻,最后中弹牺牲在沈阳北大营外围的战场上,此事鲜为人知。笔者认为,张占元主动提出抗击日军一事,应当载入史册,为人们所铭记。

从经济视角看抗日战争(河北师范大学 戴建兵)依照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因而从经济的角度去审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抗日战争研究深化的重要领域和途径。从经济视角看抗日战争,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入侵中国是否也像德国一样,是那个时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争夺国外市场,而通过战争达到经济目的,即,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之路,亦或其他?由此抗日战争为什么爆发?日本战争的目的?战争进程中日本策略的变化等,都会有新的思考和结论。

第二个问题,日本占领中国后,是不是只有政治的殖民和军事的残暴?日本占领者在经济领域作了什么事情?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是什么?其经济目的是什么?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永久占领,还是另有经济目的?日本为什么会对占领区分而治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策略,为什么侵占东北后将财团引入东北,而在占领华北后搞华北开发公司,搞交通和经济开发,推行所谓华北十万眼井计划,以增加农业投入产出等一系列的以煤、铁、棉和劳动力为主要索取对象的“经济建设”?对江南采用更直接的掠夺,其目的是什么?是维持国内经济发展还是直接支撑战争,还是两者兼顾?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

第三个问题,日军的“以战养战”策略被打破了吗?传统的抗日战争研究中,特别是在当时的宣传中常说,我们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实际上,以战养战的总体策略是什么?日本在抗日战争中的总体对华经济战的策略是什么?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总体经济政策与这一策略的关系,以及具体部门经济战的策略和实践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学术领域。日本在抗日战争中使用经济战的手法,最大程度地打击了中国经济,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同时增强自己的力量,采用了不少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运用中国的法币套取中国的外汇,再用这些外汇获取战争物资等。再如,公债政策,利用伪政府发行公债,偿还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甚至理解不了日军会给强迫修炮楼的老百姓工钱,认为日军只是烧杀抢掠,实际日军支付是伪政府的钱和日军军用票,以此打击国民政府的法币,这是日军货币战的重要策略之一。

第四个问题是日本战时经济是如何维持的？中国的战时经济是如何支撑的？中国战时部门经济是如何运行的？抗日战争中中方有无对日经济战的总体策略，是什么？实施的效果如何？只有搞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总结并依然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第五个问题是强化抗日战争时期部门经济史的研究，从而构架抗日战争经济史以及反映抗日战争全貌的抗日战争史。从目前抗日战争经济研究来看，特别是从部门经济史的研究来看是非常薄弱的，一些重要的部门经济史目前还没有成型的专著或有代表性的论文。有的学者还突破不了日伪经济建设目的与日本经济发展以及支撑战争的思想栅栏，从而限制了伪政权以及日本在华经济活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需要对三面四方相关经济交往的多层面、多角度以及部门经济角度进行思考，难度较大。但是，抗日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而学术界竟然没有一本像样的《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史》，也说明了对其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最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一定要注意战时经济运行的规律与平时经济运行的规律是不一样的，不能用平时期的经济思维考虑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如，平时期国家间常用货币贬值的办法开打货币战，但在战争时期开展货币战的手法往往会拚命贬低对手的币值。

解决日本战争遗留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北京大学 徐勇）所谓日本战争遗留问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由盟军战后处置而未能完成的日本战争犯罪及其责任的追究。这些问题根源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所进行的对外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其数量极多，内容复杂。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都是战后处置不彻底而遗留的典型案列。战后以来的相当时期内，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一直试图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早在1956年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中，就宣布：“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了”。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及社会右翼大肆宣传与中、韩等国，不存在战争遗留问题。1995年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宣称“战争问题已在外交上解决”。

但是，日本政界宣传的虚像，终被历史的事实打破。1991年8月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1924—1997）第一个站出来揭示历史真相。坚持和平与正义立场的日本学者，于1993年联合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创办研究型的季刊《战争责任研究》。在中国，1997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开辟了“战争遗留问题”专栏。中日韩多方学者通过史实调查、通讯报告、问题研究等方式，有力地论证了战争遗留问题的存在真相，并展开了极重要的学术研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回响。1992年4月1日，江泽民访问日本前夕就中日关系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于一些战争遗留的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地妥善解决。”1997年9月桥本龙太郎在访华前说“日中两国间有一段不幸的过去，现在也有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两国领导人的说法，均确认了战争遗留问题的客观存在。

战争遗留问题，大体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战争责任判断与历史认识类，如靖国神社、教科书等问题；第二类是由日本侵略战争所影响的包括领土、海洋经济区等国家利益关系类，如钓鱼岛、东海划界、美日之间的琉球群岛移交问题等；第三类为民间战争受害类，数量较多的有劳工、慰安妇、残留生化武器受害及军票等悬案。上述三大类问题，都曾属于东京法庭及整个战后国际审判所清算审查的范围。其中第一类的战争责任认定、战争史观与第二类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直接关联着国际法领域的“破坏和平罪”，即A类战争责任问题。第三类民间受害类为数最多，主要涉及“违反战争法规”及“反人道罪”，即通称的B、C两大类战争责任范围。

在日本政界，包括内阁大臣级别的政界高官、右翼势力，否定战争责任、否定战争遗留问题存在

的言行随处可见,顽固坚持否认与不反省立场。迄今出现的几乎所有的遗留问题的处置,均无实际结果,包括人道范围的慰安妇、劳工、盟军战俘等诉讼案,受害原告方几乎无一胜诉,甚至遗留在中国国土化学武器伤害当地居民的现实案例,日本政府也逶迤拖沓,不予有效解决。问题还有,日本政界右翼歪曲侵略历史的同时,正在全力推进修改宪法第九条,要求进一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突破不保有进攻力量和核武器等原则的约束,构建更强大的具有对外威胁性的武力。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趋势。

研究和解决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不仅十分紧迫,而且也是可能的。国际成例可以参考德国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对于战时日本侨民的赔偿。联合国大会1968年11月26日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欧洲理事会1974年1月25日签署的《战争和反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的欧洲公约》,1993年6月25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25段等,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国际法依据。在日本国内,和平民主派的活动与坚持,也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正面力量。日本政府能否重塑有道义感、有尊严的“普通”国家形象,东亚各国人民如何提升解决日本战争遗留问题的思维与行动能力,都将共同影响东亚国际社会的未来走向。

东北抗联精神述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李倩)东北抗联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铸就的革命精神。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升华,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最严酷的岁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悲壮的历史时期。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被日本侵略者严密封锁、与内地隔绝的极度艰苦条件下,坚持抗击敌人,自始至终达14年之久,直至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孕育了伟大的抗联精神。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东北抗联各军主动出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期间,伪军警普遍动摇、反正,加入抗联部队,抗联各军发展迅猛异常,到1937年下半年兵力已达3万余名。东北抗日联军的迅速发展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使日本殖民统治者深感不安。为巩固其侵华战争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向东北大量增兵,对各地抗联部队进行包围、分区“讨伐”,并疯狂推行集家并屯的野蛮措施,企图“聚而歼之”。加之,东北严寒的自然环境,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转入极端艰苦阶段。在严酷而惨烈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以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顽强奋斗,英勇不屈,毅然决然地献出宝贵而年轻的生命,用鲜血谱写出了壮丽的爱国诗篇。正是东北广大军民有了万死不辞、一往无前的钢铁般的奋斗意志,有了忠贞刚烈、威武不屈的优秀品质,才孕育出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

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军民,挑战生存极限,与敌人作战万余次,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毙伤日军18万余人的战果、牵制日军70万人的奇迹,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联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高度体现,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精神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万众一心,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有着反抗侵略光荣传统的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以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冲破了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束缚,自发地掀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浪潮。2.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论在烽火弥漫的战场,还是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监牢,东北抗日爱国志士都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态度,勇于牺牲,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3.挑战生存极限,充满必胜信念的艰苦奋斗精神。东北抗日军民在挑战生存极限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靠什么支撑着

他们顽强地坚持到抗战的胜利？靠的就是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因为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才会产生在极度困苦环境中战胜一切困难的超凡勇气，才会产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顽强斗志，才会产生在敌人屠刀下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才能经受住血雨腥风的洗礼和考验。4.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有效杀敌战略战术的创新精神。从实际出发，依据东北的特点，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创造出以弱克强、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法，展示了抗联将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5. 休戚与共，团结战斗以求共赢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国际反法西斯旗帜下，中、朝、苏人民精诚团结，并肩作战，阻延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直至抗战胜利，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联精神作为沟通历史、现在和未来的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已成为具有东北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名品牌。一些抗联遗址已被列入国家或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对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精神文明”教育的载体，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国共合作抗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居之芬）笔者在重读中国抗日战争史有关图书和史料集时，对国共合作抗战又有了一些认识。具体说来，一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式，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而不断变化，并非一种形式。如，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直接合作抗战；在战略相持阶段，分为正面与敌后战场，国共两党军队各自牵制、消耗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抗战反攻阶段，国共两党都与盟军合作，分别从西南、东北两个方向进行战略反攻。

二是国共两军抗击日军的比例。仅从进入关内的日军看，在战略防御阶段，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正面战场国民党正规军，因此，正面战场抗击日军比例大。进入相持阶段后，两个战场抗击日军比例基本相当。八路军即经常抗击的华北方面军，占关内日军总数的40%以上，加上新四军在华中，东江、琼崖纵队在华南、海南抗击的日军，总比例应与正面战场相当。在战略反攻阶段，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虽失利，但日军将华北方面军的一半兵力调往华中、华南对正面战场作战，才使八路军能在华北率先反攻，因此，正面战场抗击日军比例要大些。然而，从全局看，几十万关东军都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联在抵抗。因此，应该说，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军抗击的日军比例基本相当。

三是关于抗战与改革的问题。八路军是在基本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抗战，1939年末国共第一次摩擦后，八路军就很少得到国民政府军委的资助。为在艰苦的华北敌后坚持抗战，中共坚持边抗战，边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即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团结了敌后95%以上的各阶层人民；经济上实行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缴租缴息，既让贫农有地种有饭吃，也让地主、富农、工商业者有饭吃有钱赚；还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解决吃饭穿衣和武器制造，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因而越战越强。国民党军集各国外援于一身，特别是1941年后美援与美式装备的涌入，国民党军有钱有枪，有恃无恐，不思改革；只抓军事，不重民生与民主。结果，政治独裁黑暗，官僚腐败贪脏，经济崩溃，民怨鼎沸……战时民众为生存可以忍耐，战争胜利后若不顾民生再打内战，民众就要造反。

四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与“游而不击”的宣传，均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统一。以往大陆和台湾在有关抗战的宣传中，互相攻击，中共说国民党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国民党则斥八路军为“游而不击”。这两种说法均不确实。国民党军反共是有的，因为怕中共坐大，夺了他们的政权；但想消极抗战却不可能，因为日本人要消灭它，不抗战就不能生存。同样，中共在敌后也不可能“游而不击”，因为它随时面临日伪军队的围攻与清剿，不抗战也无法生存。这两种宣传均妨碍了对真史的认识，更不利于海峡两岸的团结与统一，故应改正。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的对粤举措及其影响（南京大学 张生）1931年，是战前中国GDP的

高峰；而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击败国民党内群雄，政治强人一统中国端倪再现。当政者此时如能居安思危，料敌机先，当有机会趋福避祸。然而，此时的蒋氏，自恃权柄在握，处理内部分歧，竟出下策，将胡汉民软禁，引致内部巨大混乱。若干年后，他自省道：“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蒋介石1941年6月9日日记）

中国混乱之中，日本军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积极筹谋，乘机发动九一八事变，改写中国历史。危机之中，蒋之对粤举措，对此后的民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民国以降，广东久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中山先生以粤为基地，不断革命，客观上亦造成国民党内粤系力量之尾大不掉。“九一八”之前，粤方借胡案，集合众多反蒋势力，已成大患。蒋介石本预料当月22、23日左右与粤桂决战于湘境，令十九路军占领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以为准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武力解决方案在事实上已不可能。蒋更判断，日军乃“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1931年9月19日日记）

日本之动作既与粤方如此关联，蒋乃急图粤案之解决。其思路有二重点：

（一）相忍为国，共赴国难。蒋决定：“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亦可。”（1931年9月21日续20日日记）然要胡、汪合作，粤方竟以蒋下野为条件，蒋“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1931年9月22日日记）然粤方内部复杂。据吴稚晖谈，有超然派、右派、西山派、桂系、改组派、第三党等6派之多。胡汉民脱出南京居间捭阖，内部意见更形分歧，仅蒋中正下野、改组中枢为其基本共识。双方函电交驰，全为权位，蒋愤懑不已。孙科、汪精卫因历史、地位等关系，居于显要位置，经常代表粤方发言，与蒋也多所折冲。但蒋对此二人，实深鄙视。蒋评孙云：“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息也。”（1931年10月22日日记）“哲生不肖，总理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1931年12月13日日记）对汪精卫，蒋则认其在“中山舰事变”前即图谋害己：“回忆彼（按：指汪精卫）于民国十五年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厉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议以谋我，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逊威。”（1938年12月25日日记）对此二人，蒋介石能折节相让，虽政治家多所权谋，亦有诚意在焉。

（二）分化粤方。粤方内部庞杂，陈铭枢等其时正与蒋亲昵，蒋探知粤方内情，多假手陈铭枢。反蒋粤系内部仅陈济棠、李宗仁握有军事实力。孙科、汪精卫虽依附其唱高调，实以主掌南京为目标。蒋中正得陈铭枢等人密报，乃运作其二人入京。胡汉民介入其中，反复呼吁粤方团结，不要为蒋所间。蒋评之曰：“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1931年10月30日日记）惟胡氏刻薄寡恩，除二三位亲近外，并无号召力，与汪更有宿怨。汪与之敷衍，实则积极预备北上，甚至决定：蒋中正不下野，广东诸人不到南京，其亦愿到南京参加国难会议。粤方内部之分裂，为蒋洞悉。蒋中正一方面图谋分化陈济棠内部，力求釜底抽薪。

他致电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人，劝其脱离陈济棠，并以高位相诱。当时，未见实效，但5年后，上述人等响应南京，陈济棠几乎一夕崩溃，应有此前因。另有张发奎部，因汪精卫关系，在蒋离间下，脱离与桂系之反蒋联盟。另一方面，则忍痛接受孙科必须其辞职的条件，使其脱离胡粤，并联汪制粤，分化汪、孙。本来，汪在蒋之拉拢下，对合作条件甚为满意，但因与孙有共进退之约而罢。孙科积极推进“责任内阁”，自居候任阁揆，汪仅得预备“虚位化”的国府主席。两人渐至分道扬镳。11月初，汪氏在上海说道：“兄弟……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汪派12月3日在上海独自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中委。后蒋招待汪派全体中

委，显示承认之意。孙科内阁上台后，汪则滞留上海，不予支持。汪、蒋合流，乃有后来烟霞洞会议之召开，直接促使孙科垮台，蒋得以再度复出。

蒋之对粤举措，主要影响有五：1. 粤系挑战，牵扯蒋巨大精力，“内部不固”，使蒋不能倾力应付日本侵略。蒋曰：“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攻守同盟。”（1931年10月23日日记）2. 粤系在1924年、1927年前后，已经新陈代谢（罗志田语）；九一八后，蒋之举措，以退为进，使其成员再度分化、剥离，粤系在民国政坛上之挑战力进一步削弱。3. 汪精卫妙手空空，运作此次危机，得以重返南京政府核心，但已不得不接受蒋之领袖地位。4. 孙科经此一役，已不见容于粤系主流，只得在蒋、汪体制内以立法院为基地做批评者，“总理哲嗣”光环已褪，影响力大幅下降。5. 粤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后仍时时挑战南京权威，蒋一直视其为政治核心议题之一，图谋解决，至胡汉民死后，利用两广“六一事变”，将其基本收服，为抗战准备一基地。但抗战中，汪精卫、陈公博等再度脱出。粤系反中央之传统可谓根深蒂固。

国民政府战前与战时的防空建设（杭州师范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 袁成毅）飞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随着空袭的不断发生，防空也应时而生，并逐步形成防空体系。在欧洲国家的防空体系中，以英国的最为完善。空战中对于非军事目标和平民的无差别轰炸，也促使国际法学界开始探讨对空战的限制，虽经多年努力终未获致列强各国的普遍认同。相反，意大利军事学家杜黑的“制空权”理论问世后，各国颇以为然，事实上该理论也为以后各国空战的不断升级提供了理论资源。

中日两国发展航空都始于对欧美国家的仿效，而且起步的时间相近。晚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数次派人到欧洲等国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同期的革命党人也在海外组织人员制造飞机。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理论，并在广东建立起了自己的航空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地方割据势力纷纷组建航空队，甚至还投入到割据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各地的航空力量进行了初步整合，但与同期日本的航空力量相比，差距之大，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因此日本发展航空业一开始就具有军事意义，它不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官营与民营并存的飞机制造企业，而且还分别在其陆军和海军中成立了航空兵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航空兵初试于战场，此举极大地提升了日本进一步发展航空的信心。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对中国锦州实施了空袭，这是中国首次遭遇的空袭。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又对上海及周边的杭州、苏州等地多次进行空袭，造成了中国军民的巨大人员伤亡。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是举国掀起航空热，其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不断扩充。与此同时，中国的防空问题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

国民政府先是组织了航空委员会，对分散于各地的地方航空力量进行了再度整合，另外也开始设立航空学校，培育航空人才，还与美、德、意等国合作建立飞机制造厂，以期壮大自己的航空力量。有鉴于日本侵华态势的不断发展，国民政府也开始认真研讨未来的防空计划与战略，在积极防空方面主要是扩大了航空队，新建了地面防空部队；在消极防空方面，设立了防空学校，成立了专司防空的防空处（防空委员会）和省一级的防空学会，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在实施防空演习的过程中，相继建立起了防护团、防空情报网。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在各地举办了防空展览，开始对民众进行防空教育，此外也开始了防空设施的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日双方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京沪杭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空中作战，战前的防空建设举措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空军虽各方面处于劣势，但还是取得了良好的战绩。主战场转到武汉地区后，中国方面虽得到了苏联空军的支援，但损失巨大。武汉会战后，中国空军基本上难有作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组建不久的地面防空部队随着战局的变化，被先后布

置于各战略要地,对日本空军的进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日军占领武汉后,由战争初期的“战略轰炸”转为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略轰炸”。因此,中国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 and 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遭受了来自日本航空队持续不断的空袭。中国空军此时多处于整修状态,地面防空部队也由于战线延长,难以得到充分的配置,中国的积极防空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国民政府只得更为重视消极防空,通过防空体系的不断调整,尽可能减少民众的伤亡。

战时日军对中国各地普遍都采取了空袭的作战手段。大体来讲,在抗战初期,东、南部地区是防空的重点区域;随着武汉作战的开展,中部地区成为重点;武汉和广州沦陷后,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则成了重点防空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空军的对华援助,西南地区和东南部地区再度成为防空的重点。在不同的时期内,各地采取的消极防空措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美对日本的正式宣战,美国加大了对华空中援助,同时也加紧对中国空军力量的培训,这为中国制空权的获得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由于日本将在华航空兵力较多地转移到西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的空袭逐步由“政略轰炸”转变为“战略轰炸”,并减少了空袭的频度,中美空军逐步获得了制空权。

总之,从积极防空的角度来讲,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在战争前期以弱对强,战果明显;在战争后期,配合美国空军夺取了中国境内的制空权,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消极防空的角度来讲,战前初步构建、在战争中逐步完善的消极防空体系,对于减少民众的伤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国防工业落后、防空武器的对外依赖性太强,使中国过早地丧失了制空权;国民政府战前由于对全国的统治呈地域上的强弱差异,在防空建设上缺少战略纵深发展的准备;此外,由于防空人才的匮乏以及民众对于防空的侥幸心理等因素,使某些本可避免的灾难却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的深刻教训。

太行山与中共华北抗战(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岳谦厚)太行山是八路军和华北人民坚持抗战的坚强堡垒,太行山区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过程中最具魅力的一个区域。中国人谈到中国革命必然会想到太行山,谈到太行山又必然会想到中国革命,因为太行山书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奠基石。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三师主力相继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强大的正面攻势。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逐步进入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到1938年3月,山西主要地区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山西境内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干线,广大农村则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恒山、吕梁山、太行山等山脉为依托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并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抵抗遥相呼应,共同支撑了华北乃至全中国持久抗战大局。而以太行山脉为战略支点的各抗日根据地则是八路军的中枢根据地,八路军虽经发展壮大并向整个华北乃至华中地区迅速扩展,但以之为依托的各抗日根据地担当的基本角色及其领导地位未曾改变。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抗战期间始终转战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太行地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均曾在此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因之被侵华日军视为建立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碍,日本华北方面军长期将之作为主要作战地区,以从根本上捣毁八路军中枢指挥系统和消灭八路军主力。然而,太行山的共产党人及其八路军不仅未被消灭,相反越来越强,最终将日军赶出太行山,赶出全中国,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宏愿。

“兵民是胜利之本”，根据地人民的人力支持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先后进行“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等数以百次的扫荡或报复进攻，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残酷杀戮，成千上万群众加入抗日队伍。太行山上的人民群众将多年不用的矛枪、大刀、土枪、土炮搜罗出来武装自己，组织自卫队，打击日军，并踊跃从事诸如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运输等抗战勤务。各地群众在山头之间、村庄之间设置诸如消息树和鸡毛信等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以使我方指挥机关及时了解敌人动向。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以破路拆墙为内容的改造地形运动，甚至将狗打死，造成“行军百里无狗叫”，以便八路军夜间活动。各地普遍建立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至1939年春全区参加这些团体的群众达140万人以上，形成“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战热潮。据统计，其间太行区先后有117573人参加八路军；其中14万人口的武乡就有9万人参加工、农、青、妇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有1.4万名青壮年参加八路军等抗日部队，又有5300名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在人民群众支援下，八路军一二九师由进入太行山时的9000余人发展到1945年9月的近30万人。

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障。太行根据地群众在自身财力、物力十分困难情况下，仍源源不断地供应抗战所需的大量粮食、被服和军需物资，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繁重的战勤服务。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使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充分保障。百团大战期间，晋中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储备干粮熟食、破路工具，肩挑人扛、牲口驮，支援过往部队或送往前方。据统计，仅战役第一、二阶段晋中地区就出动民兵2万人，参加破击、运输、抬担架、当向导、送情报等任务；动员群众7万余人，征调牲口4500头，参加破路斗争；供应军粮1.4万石、电线杆1800根、柴草100余万斤、军鞋3万双、蔬菜2万斤、羊1000多只。在晋东南地区，民兵和群众参战支前工作同样十分活跃。如武乡民兵和群众万余人分赴白晋、正太、榆社等地参加各种支前活动，三专区提供战争用工767801个、米90040斤、白面197.8万斤、食盐48945斤、柴炭400万斤、饲料35万斤。由此可见，太行人民为山西和华北抗战的坚持及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中国共产党留用日籍人员的重要意义——以山边悠喜子为中心的个案分析（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高晓燕）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日本战俘、侨民中留用、征用了一批技术、医护人员。这些日籍人员充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对共产党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仅就笔者采访原解放军四野卫生兵山边悠喜子参加中国革命事业的经历，分析共产党战后留用日籍人员的重大意义。

山边悠喜子1929年1月出生在日本东京的幡谷，12岁随父亲来到中国本溪市。1945年，战败的日军抛弃了日本侨民，自己先逃跑了。本溪市最初被苏联军队占领，后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最后是八路军进驻。有一天，东北民主联军在小报上刊发通告，征招有简单医疗知识的人。山边回忆：“因为在女子学校毕业前就取得了护士的资格，我就决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据统计，当时东北9省14个市共计有31030到33000名日本人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山边是因无法回国而选择的参军，对这支军队并没有多少了解，甚至有一定的疑虑。部队通过思想教育，让她正确认识时局、扫除军国主义旧观念。前线士兵的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伤病员在没有止痛剂的情况下，坚强忍受伤痛的折磨；部队南下，百姓为伤员腾出自己的房子，把新婚的被子拿来给伤员用，脓和血弄脏了被子也毫无怨言。山边看到这一切，思想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山边悠喜子从16岁到24岁，在解放军大学学校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教育。她跟随部队从东北到东南，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战争的考验，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她

曾说：“至今还眷恋着那种生活，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1953年，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战后留用的日籍人员陆续离开中国。“由于在中国受到了教育，我们对日本社会的现状有判断的能力。这时，我才感到了接受解放军教育的伟大意义”。

一是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山边女士把中国当作了自己的故乡，每年都要来中国几次。她丈夫山边贤藏是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结识的战友，曾在林弥一郎领导下帮助八路军创建第一支空军。山边贤藏去世后，遗愿是把骨灰撒到长白山上。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片中采访了许多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老兵，他们几无例外的回答：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二是成为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卫士。山边退休后参加了日本和平运动，组织日本“七三一部队罪行巡回展”，多次赴中国对“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弃“毒气弹”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取证。她说“日本政府至今还在公开发表否定侵略的言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是我的义务。”

周恩来总理曾以战后留用日本籍人员的实例阐述中日友好关系：“1945年8月15日以后，日本军队放下了武器。当时有许多日军放下武器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师。”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1/4是日本人。

通过山边的实例可见，中国共产党战后留用的日籍人员，在中国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通过政治学习，通过与中国军人的共同战斗、生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个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青年，转变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以为为人民服务为人生目标的革命者。这对于扩大军事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解放东北进而南下解放全中国意义重大。回到日本后，不论中日关系如何变化，他们始终坚持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不懈努力，成为改善中日关系、促进民间和平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实践证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留用日籍人员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是具有宽阔胸怀、长远眼光的英明决策，其深远意义影响至今。

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的教育(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暨爱民)长期以来，湘西多民族聚居区教育整体滞后，但抗战开始后，其教育却出现了全面“繁荣”景象，并对湘西民族社会及文化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具言之，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完备，规模增大。自1940年代始，湘西境内先后建立了各类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其中，中等教育发展最快，学校总数量较战前增长近20倍，学生数量亦成倍数增长，女生在学生总数中已占有一定比例。由于湘西僻处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是通往西南大后方的门户，在抗战时期许多外地学校和教育机构纷纷迁入。如国立湖南大学等近10所高校的迁入，使湘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等教育。外地学校和教育机构迁入湘西，弥补了湘西民族地区教育的许多空白，形成了自幼稚园至小学、中学、大学，这样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

(二)教师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民初至抗战之前，湘西民族地区大多数学校的教师结构呈新旧交杂情状；但在抗战爆发后，新式学校毕业的各类专门人才成为湘西地区教师队伍的主力，使湘西地区教师队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地缘结构上的多样化，学历结构上的优化(甚至一些国立和省立中学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女性亦开始进入教师队伍。这对于教育相对落后的湘西民族地区而言，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确立了各项教育规制。随着大批外地学校迁入湘西，规范化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教育法规和战时的各项教育措施，由这些学校渐次推广到整个湘西的教育系统并确立下来。其中，有关义务教育、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战时教育的法规，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通行全国的现行学制，战时所需的师资训练、各科教材的整理、教学科

目的调整规定和训育制度、导师制度，学校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在湘西逐步推行。这纠正了多年来湘西民族地区教育制度混乱、法章缺失的局面，湘西教育管理逐渐进入规范化。

(四)加强了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教育，确立了现代教育理念。自古以来，湘西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包括瑶、侗、回、壮、白等40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经济落后，民族矛盾尖锐，狭隘的民族观影响颇深。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危机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认同感，爱国主义和现代教育理念冲击并改变着狭隘的民族观。尤其是外来知识分子在湘西各族民众中的宣传影响，使民族国家观、民族平等观以及教育的权力观深入民族社会各阶层。另外，他们带来的现代学校教育思想、先进的教育理念，逐渐融入湘西民族教育的实践之中。这是湘西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次观念革新，推进了湘西民族地区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为以后湘西教育的发展积淀了扎实的思想底蕴和现代教育的观念基础。

战时湘西民族地区教育呈现出幼教、初等、中等与高等教育体系相对完备，布局平衡；适应战时形势，服务抗战需要，以及民族教育“空前繁荣”的“外源性”特征。战时湘西民族地区教育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主要是因为：1. 外地学校纷迁湘西，极大地支持并推动了湘西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2. 由于时局变化和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湘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移，改变了省府和教育厅的教育方针与政策，转而重视和扶持湘西民族地区教育。3. 湘西各族人民为改变相对落后面貌，积极要求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权利，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抗战时期湘西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既为今天该民族地区教育布局及其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应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法定为国家“胜利日”(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李晓方)2005年5月30日，齐齐哈尔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把每年的8月15日定为齐齐哈尔市和平节的议案。从此，齐齐哈尔人民有了自己的节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之时，美、英、法等国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前苏联则将5月9日定为战胜德国纪念日。几十年来，英、法等欧洲国家和前苏联一直把这个难忘的胜利日，作为全国的盛大节日来纪念。1995年4月19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了永久纪念5·9胜利日的法令。该法令规定5月9日为俄罗斯全民性节日，休假一天。韩国将日本战败投降的8月15日法定为光复节，放假一天，并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与日本侵略者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日与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鉴于近来有不少人对这段历史有所淡忘。故而，笔者在此呼吁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升格为法定的“国家胜利日”加以纪念，规定在这一天全国上下举行重要纪念活动，拉响防空警报，鸣喇叭和汽笛，并放假一天。同时，希望全国各地积极保护抗战遗址、遗迹和恢复重要抗战遗址、遗迹，以发挥其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研究》20年与“日本细菌战”研究(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孟晓旭)1991年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深入和发展。就“日本细菌战”研究而言，更是获益匪浅。《抗日战争研究》创刊20年来，共计发表37篇有关“日本细菌战”的文章，平均每年约为2篇。作为一份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季刊杂志，如此眷顾“日本细菌战”研究，无疑促进了社会各界对“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关注与深入研究。据笔者分析，这38篇“日本细菌战”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5类。

第一，专题研究型。如，《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概况》、《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有待解决》、《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简评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判决》、《华北(甲)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战犯罪》、《日本细菌战研究述

评》等,共计8篇论文。

第二,研究综述型。如,《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综述》等,计有两篇文章。

第三,书评、书讯及对相关组织或研究成果推介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继续编辑出版》、《关于战争犯罪问题日中合作研究的新尝试及其两项成果》、《〈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出版》、《揭开日军细菌战的重重黑幕——读哈里斯著〈死亡工厂〉》、《〈细菌战大屠杀〉一书评介》、《深入挖掘一手史料,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评王之鑑著〈日军暴行目睹实录〉》、《维护史实、追讨公道、保障和平——记美国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书介》、《书讯》《中国华北的细菌战——日军1855部队细菌战华北受害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共有9篇短讯。

第四,史料发掘、介绍与研究型。如,《加强史料工作是深入抗日战争研究的基础》、《太平洋战争新资料——日军以细菌战攻击美军和美国本土内幕》、《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等,有3篇文章。

第五,展览会议通讯型。如,《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展览在京举办》、《日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罪行展在日本和美国展出引起强烈反响》、《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日军在华细菌战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沪举行》、《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举行第四届学术年会》、《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综述》、《“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香港“日军战时暴行见证会”综述》、《“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二审诉讼声援大会”在义乌举行》、《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日本侵华战争民间索赔座谈会》、《“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东京国际集会综述》等,计有15篇展览或会议综述文章。

从文章数量看,《抗日战争研究》的“日本细菌战”文章主要侧重于两个类型。一是展览或相关会议的通讯;一是书评、书讯及对相关组织或研究成果推介。该刊之所以侧重这两个方面,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使读者及时了解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研究特点看,《抗日战争研究》中的“日本细菌战”文章,主要有4个特点:1.注重史料特别是原始资料的利用,2.注重研究的新角度和新视野,3.注重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4.既重学术研究也不失现实关怀。从集中程度看,除1992、1993、1994、2007、2008年这5年没有“日本细菌战”文章之外,其余15年都有细菌战问题的相关文章。其中,2002年发表相关文章最多,竟达7篇。

从研究主体看,在《抗日战争研究》上发表“日本细菌战”专题文章的学者,全部具有史学背景。陈致远、朱清如在《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曾说:“目前中国参与这一研究的队伍人员众多,有地方文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文学作者、新闻记者、受害者遗属等等,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的并不多。”但从《抗日战争研究》发表“日本细菌战”专题文章的学者全为具有史学背景者这一点看,反映了该刊发文的学术水准之高、专业性之强。

(责任编辑:徐志民)